

一个中国学者的 世界话语

辛旗 / 著



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内涵
一个国家作为功能整体来说
包括政治制度

经济基础以及调节各阶层利益的社会组织三个部分
表现出来的就是政治力
经济力和社会力

而贯穿其间

协调三种「力」之间关系的就是文化价值体系
文化价值体系是处在政治力 经济力

社会力之上的 具有协调性

粘合性和无孔不入的影响力

因此 将文化作为软实力成了这几年的流行提法，
也表明中国发展到现在

已越来越深刻地体认到

文化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当今时代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这说明「提高文化软实力」

已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文化影响力作为软实力对内而言

就是「和谐」

我们经常讲民族凝聚力

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现在中华民族精神首先就是团结和谐

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

海峡两岸的血脉共同体

讲的就是团结和谐

一个中国学者的 世界话语

辛旗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中国学者的世界话语 / 辛旗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80142-910-0

I. 一… II. 辛… III. 世界史: 现代史—研究 IV.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6282 号

一个中国学者的世界话语

著 者: 辛 旗

责任编辑: 郑治清 孔德联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 站: www.huayicbs.com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42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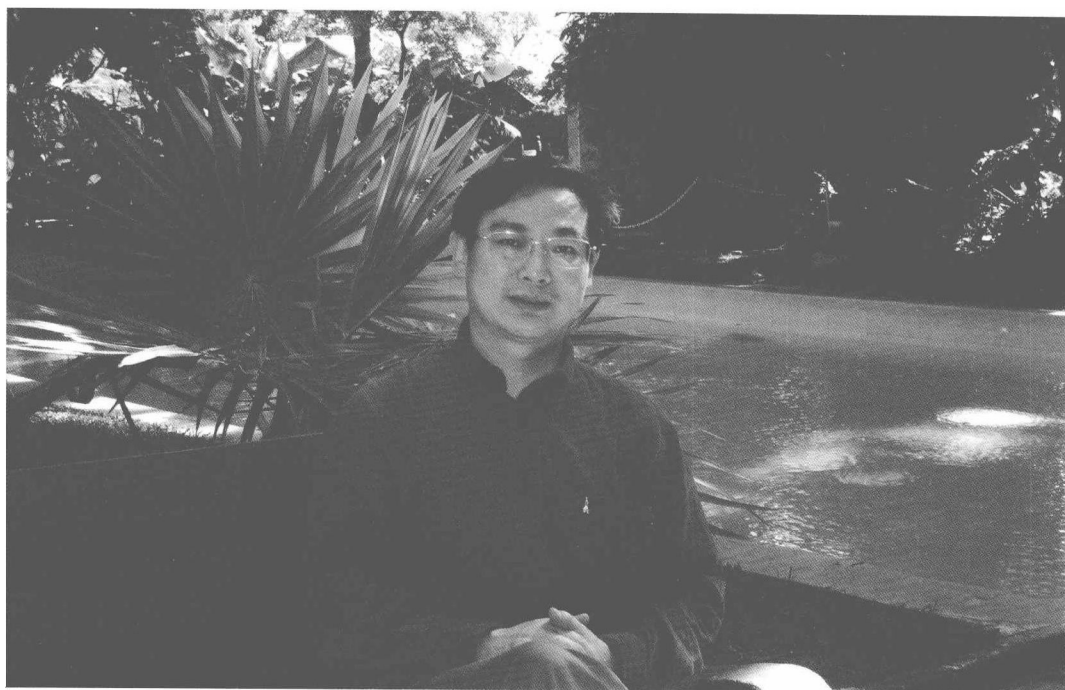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910-0 / Z·471

定 价: 32.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 简历

辛旗，字重光，满族，1961年12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定州。“文革”期间在北京受小学、中学教育，1976年步入社会，曾在工厂、医院工作。1979年考入河北大学哲学系，后考入厦门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宗教学以及国际关系、台湾问题研究。1985年开始参与中央对台政策咨询，先后参加了对台政策白皮书、重要文告及有关法律的起草。1993年起数次访问台湾，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台湾多所大学讲学。多次赴美国、日本、欧洲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96年应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赴美访问一个月，与美政、学界进行广泛对话。多次率团访问美国、印度、韩国、蒙古、朝鲜等国，就国际关系、地区安全问题进行高层对话与战略磋商。现任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出版专著有：《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中国历代思想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魏晋哲人阮籍评传》、《文化新视野——看世界、论中国、说台湾》、《百年的沉思——回顾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跨世纪思考——以台湾问题为焦点的综合研究》等。主编台湾问题论文集六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政论文、散文、诗歌以及文物鉴赏方面的文章等数百篇。撰写电视系列专题片《黑白魂——围棋与中国文化》、《自强之路——中国工业发展寻踪》等。曾在中央电视台国际卫星频道“海峡两岸关系论坛”节目担任嘉宾主持人。

改革开放与中华文化软实力（代新版序）

辛 旗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不久前，我参加了蒙古国家战略研究所的学术研讨。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系统展现出的令人惊奇的中华文化元素。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进程中，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世界上有上百个遍及各国的孔子学院，每年几乎有好几次中国文化节以及中华文化与世界的交流活动。我 1992 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曾撰文评价此书比美国亨廷顿教授《文明冲突》的论文发表的还早，而且是 20 万字的专著。这本书连续再版了五次，我一直没有对它的内容进行修订。而历史的演变，让我惊奇地发现很多有关文明冲突事件被我在书中不幸言中。今天从中国与世界的共存之道来谈中华文化，用“软实力”这个词不适合，而更应该用“文化影响力”来表达这个观念。如果说文明的冲突是“诸神的争吵”，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应该是“多元文化君子的自白”。因为中华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它是在五千年历史演化当中不同文化的混合体，包括中国本土的道教、儒家和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思想。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不是主张民族主义，而是阐释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影响力问题。主要讲三点：

一、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继承和重塑

中华民族价值观，是全体中华民族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以及共同奉行的信念、信仰和共同选择的价值实现途径、方式等。中华民族价值观不仅有普遍的价值认同和传承，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此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体系，体现了历史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的完整统一。就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民族价值观在形成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对历史的继承不够，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悲剧。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演

进中，发展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历史断层，集中体现在固有价值观念已不能支撑中国的发展，而西方海权扩张、殖民贸易又带来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使我们无法主动选择社会演化的进程，被迫纳入了西方主导的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20 世纪的中国在东西方冲突与“自强运动”中寻求发展，开始了“双重救亡”和“双重启蒙”。“双重救亡”，即内抗衰败化，外抗边缘化。“双重启蒙”就是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接受现代的民主思想、制度观念等。由于受西方的压力过大，中华民族在近现代价值重建的过程中日益表现出革命化的趋势。革命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表现形式，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须遵循的历史逻辑。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出现历史性坍塌，在“双重救亡”和“双重启蒙”的压力下，我们极力向西方寻求价值重建的动力，希望找到一种能与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相契合的理论，于是就有了“中体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和运动。1949 年新中国建立，强大全能的国家政权及迅速的工业化战略，为中国现代化准备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动员能力，但也带来了巨大社会成本。如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在西方军事、经济封锁之下，不得不采取被动、自卑和抗拒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在完成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功近利的激进社会变革；在经济建设中出现好大喜功的盲目急躁心理；在社会管理和思想领域采取过于集权的“倒果为因”的思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进行历史反思的遗产。从 1979 年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仍然是中国“自强运动”的继续。遗憾的是一开始我们只注重经济发展，一窝蜂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去赚钱、追赶西方的物质发展水平，所以我们在“器物文明”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而在“制度文明”方面以及在价值观的重建上却出了问题，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文化的缺失与浅薄。诚然，“器物文明”的进步，使我们有了重新弘扬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基础，有了致力于塑造民族价值观和全面迈向“制度文明”的勇气。所以，中共中央在十七大决定花大力气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将我们在“双重救亡”和“双重启蒙”过程中，以及在强化“器物文明”发展阶段里被边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能重新恢复起来，把被搁置了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精髓重新梳理出来。就传统文化而言，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古典文学，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以及绘画与书法、传统音乐、舞蹈与戏曲，等等。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必须要补的文化课。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和集中反映，包括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和谐万邦”等思想，表现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道义等特征。这些思想的重新恢复和发扬，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表征。

因此，当代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塑，首先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精髓中找到与现实的契合点。其次才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开放，从世界文明和时代发展中汲取民主、法治、公平、和谐、文明，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等概念。由此形成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诸如自立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科学意识、生态意识、公平正义意识，以及改革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等。这些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价值观念既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形塑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中国以良好姿态融入世界的重要体现。

总体看，民族价值观的重塑和文化影响力的发展，途径不外乎对传统文化的再造和对外来文化的消化。我称之为“创造性转化”，即以“创造性转化”的精神，来达成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现代化，创造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华现代文明，这既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模式。

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内涵

一个国家作为功能整体来说，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及调节各阶层利益的社会组织三个部分，表现出来的就是政治力、经济力和社会力，而贯穿其间、协调三种“力”之间关系的就是文化价值体系。文化价值体系是处在政治力、经济力、社会力之上的，具有协调性、粘合性和无孔不入的影响力。因此，将文化作为软实力成了这几年的流行提法，也表明中国发展到现在，已越来越深刻地体认到文化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说明“提高文化软实力”已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文化影响力作为软实力对内而言，就是“和谐”。我们经常讲民族凝聚力，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现在中华民族精神首先就是团结和谐，56个民族命运共同体、海峡两岸的血脉共同体，讲的就是团结和谐。围绕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积淀中有一系列的阐释，儒家思想解释就是“仁”。“仁”不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爱，还有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万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以及可持续发展、环保意识和不以经济指标衡

量发展的态度等，其中都包含了和谐的思想。

文化影响力对外来说，即对国际社会来讲，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是中华民族的形象。近代以来我们经历过很多苦难，悲情意识很强，再经过冷战对峙，我们又被迫进入了一种“孤独的愤怒之中”的状态。而今天中华民族的形象应该是摆脱了屈辱与自卑之后所表现出的那种面向世界的从容、自信与自重，以及对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心态。发挥文化影响力就要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开放、包容。在世界上，中华民族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哲学思想，包括《道德经》、《论语》、《庄子》等文化典籍所蕴涵的精神。然而，由于“五四运动”中以文化革命的极端方式全盘否定中华文明以及之后中国内乱、外部入侵，很多东西没有及时整理。新中国成立后，过度强调革命式的普罗大众文化，反右运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载体——知识分子的伤害，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然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重商主义对文化的轻视及扭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最后就变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断代。现在，我们要把这种断代重新连接起来，所给予世界的，首先应当是系统、全面、深刻的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念，而不是只给人家展示放风筝、跳秧歌舞、京剧脸谱、川剧变脸、辣子鸡丁，这些不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更不是中华民族文化典雅高尚的外在形象。我们的哲学、文学、艺术，还包括我们古代的民族服饰、文物、生活方式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优秀物质文化遗产，才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外在形象。

第二是中国的国家形象。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一个新中国屹立在东方，生机勃勃，虽然有东西方阵营冷战对抗，有意识形态冲突，但仍然坚强地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社会带来的“商品拜物教”，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西方价值观念，对我们的国家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和冲击，出现了道德伦理秩序裂解，出现了唯利是图、造假、不诚信等社会现象和问题。近年来，在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中国的国家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未来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国民素质教育。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或者民族性的再造，必须把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把中华五千年文明精神、文化价值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我们现在社会通行的普世价值结合起来，摒弃那些“伪中华文化”、“伪东方文化”，摒弃商业操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些肤浅、低俗的东西，给世界一种现代的、纯正的中华文化。要弘扬真正体现正气和正义的东西，弘扬中华民族真正的传统、典雅、周正的庙堂文化。我在九年前出版的《百年的沉思——回顾 20 世纪主导人

类发展的文化观念》一书中,写到了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与环保等问题,也提到了“生态文明”。如果这些观念都能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就能给予外界一种全新的中国国家形象。未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不带有攻击性和强制性的国家行为,要与具有强大军事力量并经常攻击他国的某些大国完全区隔、完全不同;二是要有与其他国家共存共荣的和平外交方式;三是对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中国模式”进行总结和理论化的阐释,并惠益于全世界。

第三是中华文明的形象。中华文明的形象与中华民族的形象、中国新的国家形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她更宏大、更宽泛,是五千年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影响东亚与世界的文化系统,是一个大的文化共存和思考。这方面如果处理不好,周边一些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国家就会和我们争夺文明的发明权、发源权。比如,韩国与我们争“端午节”、“汉字创造”、“中医中药”的发源权,甚至涉及历史的解释和当今的地缘政治中的版图领土问题。因此,整个中华文明的形象属最高一层,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是中国历史、哲学、音乐、舞蹈、建筑、宗教、电影、绘画、戏剧等的综合。这方面我们比较欠缺,西方国家则相对做得比较好。美国的汉堡包、可口可乐、好莱坞大片,以及美国大兵的军事基地、美元等等,闭着眼睛,都能想出这些美国的“文化符号”。中华文明的形象在当今世界却很难给世界各国人们具体的“文化符号”表征。现在很多年轻人爱看韩剧,认为代表了韩国文化,殊不知这些实际上都是中国文化的体现,韩剧《大长今》里面的中医、食疗、宫廷礼仪、人际关系、甚至包括服装等,每一样都是宋代、明代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而我们自己拍的一些电视剧,却很少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实事求是地展现在国人和世界人民面前。这方面值得我们去反思。

三、发展文化影响力要强调的几种观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中国奇迹”,也使“北京共识”或者说“中国模式”作为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开始取代“华盛顿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文化影响力和重塑中华民族价值观,第一要务是要适应中国的崛起,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调整传统文化价值的内在机制,使政治、道理观念回归到适当位置,使文化价值观成为中国与外在世界交流的重要方式,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生存品质得到不断的提高、生存意义得到不断的升华。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树立科学的、合理的价值判断和观念形态标准。

第一,要确立“大生命意识”。西方文明在物质攫取和对自然的征服方面,

确实走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但也招致了破坏生态平衡、损害人类公平公正发展、戕害不同文明生存共处的严重后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观念则启示我们，人类应在生态哲学和自然道德的基础上，树立“大生命意识”。这种“大生命意识”，应该有别于西方基督教为中心的征服性文明，要强调把宇宙万物、自然资源都视为生命来一同对待。

第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未来人类应该建立起一种生态文明，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的永续发展，才能真正发挥文化的影响力。因此，要通过人与自然的主、客体角色转换，培养和激发艺术、宗教和道德感情，丰富对自然界的认知，和睦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处事之道，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要通过法制的建立，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融合力，依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人的素质和社会心理状况，吸收其他文明中诸如民主、人权和社会公正等先进思想，充实“仁”、“恕”、“均富”等中华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丰富中华文化中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哲学观念等文化要素的现代内涵。

第四，提升人“向善”的本质。西方基督教文明强调“原罪”和“人性恶”，强调“法律止恶”而忽视道德的发展，难以避免使人流于物欲膨胀，沦为制度的工具。中华文化则强调“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的社会性不易培养，人的自然性容易膨胀，将两者都不偏废，合而为一，相互协调才能形成健全的人性。这就启示我们，人类未来发展应该做到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均衡合一，在健全的人格中不断靠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各种修养来提升人的“善根”或称为“人的向善性”。

现代中国，承载着五千年的文明遗产，创造了新的中国奇迹。我们给世界提供的不仅仅是巨额贸易中的日用消费品，更是一种发展的模式；呈现给世界的不是征服，而是谐和万邦；引导人类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共处；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不是对自然的贪婪索取，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改革开放、贸易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可以“温暖全世界”，但是中国还要“说服全世界”，更要与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平等对话”“和衷共济”。

——在“世界中国学论坛”圆桌会议上的演讲

2008年9月

序

中华文明与世界潮流

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曾经以儒学为主流，产生过自己的深邃和灿烂，又以中华各民族文化宗教的传播、渗透和各支流多态纷呈，显示了其博大精深。这种深邃、灿烂、复杂、丰富的文明，都产生于以农业为主的东亚大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它们又维系了农业东亚的政治秩序及社会文化发展。从上古到近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成为一种古老的文明，到19世纪西方文明拍岸而来，这种古老的文明便面对着另一种非常陌生的文明了。

在19世纪，中国人称西方为“泰西”，西方人称中国及其近邻为“远东”。泰西和远东，都表达了一种遥远感；既存在着空间上的距离，也显示了文化上的差异。然而，借助于工业革命之后所获得的物质力量，西方人能够跨越遥远，把自己的文明带到东方。在这个过程里，英国人的舰队打开了中国的门户，美国人的舰队打开了日本的藩篱，东西方文明的交往，是以冲撞和冲突为起点的。而后，是古老的东方在形势的压力下奋起直追，开始了近代化和走向现代化。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从洋务运动以“借法自强”，带着被侵略的创痛，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明。随后由洋务而维新，由维新而革命，在变法图存的宗旨下接受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文明。与之相伴的，则是传统文化的黯淡和褪色。19世纪60年代首开洋务的那一代人心怀“中体西用”，他们接受西方文明，而意在取新卫旧。但时至20世纪前期，欧风美雨咄咄东来，中国所长成的另一代人中，又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议题和追求。这种变化，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所经过的心路历程。其中包含着在侵略者压力下产生的苦痛，以及由苦痛产生的急迫，由急迫产生的偏斜。

西方人最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在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变迁中实现现代化，因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100多年里，现代化与西方文明常常纠缠在一起，不容

易剥离；由此产生了西方人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在东方人中产生了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错觉。东西方文明的交会在最初百年中显示出来的是，西方文明的优势和东方文明的弱势。然而，时至20世纪后半期，现代化已经伸展到世界的许多地区，现代化带着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融入了本土文化之中，现代化的根须扎入了各异的民族和社会，现代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业东亚的兴起，正是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引人瞩目的现象。它们的存在与发展促成了中国人对“全盘西化”论的反思，也促成了西方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世界所拓展开来的，是文化交往中的一个理性的时代。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因之而能够从优势和弱势的对比中走出来，成为平等对话的两种文明。

站在世纪之交，回顾150多年来中华文明走过的曲折路迹，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而面对正在到来的21世纪，由中华文明关照世界，又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20世纪，一方面造就了技术昌明，物力厚富；一方面却带来失衡的生态，在这个星球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一方面用经济网络把五洲四海连为一体，使空间上分割开来的不同民族彼此联系的愈来愈密切；一方面又在百年之中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局部战争和长久冷战的痛楚。在这些矛盾中，促成了进步的东西又往往制约了进步。人人都期望明天变得更好，因此，在展望新世纪的时候，和平与发展便成为了人们的主流意识。

古老的儒家典籍《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做“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虽然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但是对21世纪以现代化寻求发展的人类来说，其中包含的智慧和洞见，却能够引出长思久想。在西方，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之后，发展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就被人类日益自觉地引入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去。这是一个“尽物之性”的基本过程，在蒸汽时代，征服自然还仅仅表现在借用风力、火力、水力以师法造化；时至今日，人类手中的粒子加速器已经做到了用一个人造的环境，把自然环境中不易显现的物性强逼出来。其间的进步速度，真不可道以里计。200多年来，这种“尽物之性”的过程，已经累积地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就和平与发展而言，“尽物之性”只体现了一面之理，和平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归宿也是人；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归根到底总是以人为尺度的。因此，“尽物之性”的一面应该结合“尽人之性”的一面。工业革命以来，物力日益丰厚，而道德日益沦落，正是“尽物之性”的一面与“尽人之性”的一面常常脱节的结果。我想，现代化是从“尽物之性”开始的，但是现代化的圆满却是在“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的同一、经济和伦理的同一中实现的。

与“尽物之性”相比，“尽人之性”是一个更大的课题，然而每一种人类的文明都无法回避这个题目。以群体为范围，“人为性”派生出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与相应的群体利益对应。利益与利益，既因分解而导致冲突；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也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走向协调和合作。两千多年来，人类经历了分解多于协同的历史，从孔子以来，儒家怀抱的“为万世开太平”之想，就一直保留在中华文明之中，成为感召人心的一种信念。“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人类利益由分解走向合作。今天的世界，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经济走向，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态势，使人们在为自己思考的时候，不能不同时为别人思考。我相信，在21世纪，先贤留下的憧憬一定会唤起人类更多的良知和自觉，使我们继续走向和平与发展。

人类能够改造自然，但是人又是自然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尽人之性”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改造自然而言，自然是人的对立物；然而人的生命又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息息都在自然之中。由此论之，“天人合一”是有涵盖性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能够支配的物质力量越来越多，但是这个过程里的代价却全都留给了自然去负担。由此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最终使人类自身成为受害者，也使人类越来越多地想起了中华文明中善处“天人之际”的那些道理。21世纪的发展，应当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来化解人与自然的对立，使人类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又尽力善待自然，回馈自然。这样做正是善待我们的生命，善待我们的子孙后代。

冷战后，世界由两极变为多极与多元。每一种人类文明都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百年来，不断自强不息的中国，正在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她将延续古老的文明，使之在现代化中别开生面。同时，这个过程也要求我们与所有的人类文明平等对话，寻求互补和互利。各有特色的人类文明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都属于人类全体。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领域都将被打破，为人类所共享。因此，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有理由确信，不同文明与文化的沟通和交融，将使空间上越来越接近的人类，在心灵上也会越来越接近。明天将更美好。

辛旗所著《一个中国学者的世界话语》一书为我们观察20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坐标。作为一个在20世纪仅有40年经历的年轻人，敢于着眼于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冲突，着眼于“尽物之性”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着眼于“尽人之性”的文化艺术伦理价值之评判，开篇立论，剖析入微，的确难能

可贵。从书中可见，他既秉承传统儒家“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情怀，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在21世纪曙光微熹之际，有这样一本深入思考人类所经历20世纪的书问世，我相信，对我们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是有益处的。是为序。

江道涵

1999年12月26日

绪 论

20世纪已经结束，这100年对人类的影响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世纪的总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生活的不同角度体验了20世纪对我们的冲击，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一个使人振奋、迷惘、憧憬、绝望、留恋、厌倦、思索、沉湎的时代。回顾这100年，观念的庞杂和繁衍伴随着物质生产和对自然征服的扩大，人类的行为也更加脱离以往几个世纪传统的束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观念与行为的互动，构成了人类生活方式中外在文化形式的千奇百态、光怪陆离，以及内在文化观念的分化和多元。

一、20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向

无论如何，20世纪的人类文化发展仍有一个基本的趋向：由上个世纪末伟大思想家引导的人性觉醒，导致对上帝的否定。理性借助逻辑和哲学的力量将科学推向人类思想的前锋位置，科学又将自然视为征服的对象。人类的工业化、现代化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将个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创造了极大的生产力和消费能力；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物质、精神财富，巨大的市场和复杂的国际关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19世纪的殖民与市场观念到20世纪初已经被“民族国家”的理想所替代，列强瓜分世界的战争、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构成20世纪上半叶的主调，工业化对人性的压制和对工人阶级权利的剥夺，把革命推向了历史舞台，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福利主义、社会民主等思想交织在战争、革命和社会自然演进过程之中。

商业资本主义成为20世纪的主角，它所要求的是“效率”，而与之相对的社会主义要求的是“公平”。“效率”与商业利润相关，“公平”与社会道德相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造成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和战争，也促使资本主义体制大幅度接受社会主义的成分而自我调节。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持续几百年的精致文化开始因商业消费而世俗化，大众文化配合着传播媒体的改进向全球扩张，观念文化在感官文化的进逼下节节退缩，古典的、理性

的、合于传统规范的文化形式作为主流文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西方文化强势的殖民扩张之下，曾表现为文化启蒙和文化自强的二元主题，但始终无法摆脱在西方物质力量优势的笼罩下，“中心”与“边陲”之辩往往成为恢复民族传统的理论凭借，那些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又面对“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一时难以找到恰当的定位，其文化呈现双重性。

狭义的文化与艺术对20世纪的影响是与个人分不开的，任何人难以脱离文学、绘画、音乐、戏剧、雕塑、建筑、舞蹈、电影、电视等艺术形式的影响。这一影响促进了社会的裂变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同时也隐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人类理性和自然本性的规律性及传统范式的否定。

金融资本如泛滥的洪水冲决了民族、国家、地区的人为藩篱，给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人类因为科技和信息的发展，逐渐陷入网络化的社会生活中，现实世界愈来愈带有虚拟的性质，人类个性的表达不得不迁就于网络化的世界、多面向的资讯和消费选择，迫使人们更加零碎地分割时间和生存空间。人们无法再做自我的主宰，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下随波逐流，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网络之网上的“结”，人们减少了对周围环境和自身存在价值的哲学和理性思考，追逐感官愉悦和消费价值的情感正逐渐左右着人们的传统信仰。

二、“文化”之谜

“文化”一词一直是诱人的“谜”。

“文”这个字在殷商甲骨文中的象形是一个站立着的腹部画有纹饰的人，它在中国古代最初的含义是“纹饰”。原始祖先对自然和动物的崇拜，激荡了原初的观念信仰，具体物质的图腾，产生了抽象的物形和纹饰，起初是涂抹、纹刻在身上的线条，渐渐地形成了对各种经人加工后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纹饰化”，即人赋予各种主观和客观物质以“有意味的形式”。这些渗透在精神和物质层面的“有意味的形式”代代相传，再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出多种形式、系统、范式和地域特征、族群特征，始终影响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结构。

通俗地讲，“文化”是人类以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区别于自然和动物世界，并进而对各种主客观事物所进行的外在和内在有形或无形的规定。套用现代商业

用语，类似于“包装”。既然是对各种事物的规定，那么文化必然要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联系，于是有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等等。“文化”似乎可以涵盖一切。

其实，“文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前文所论及的基本是广义的文化概念，至于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是指用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戏剧等）或以电视、电影、多媒体等形式展现人类文明的物质与精神等各个方面“有意味的形式”的总和。广义的文化则重在人类观念、行为对自然和社会的交互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决定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种趋势。

三、西方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

对“文化”进行准确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1952年，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Kluckhohn）合写了《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列举了从1871年至1951年的80年间学界关于“文化”的164种概念。他们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范畴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概念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揭示某些社会对象或整个历史过程的特殊性。此外，文化的界定，还直接关系到能否满足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要求，而首先是满足历史学的需要。”^①文化是历史过程中的概念，离不开历史事件，本书将以历史事实为基本素材，以史出论，以论带史，在文化与历史统一中，揭示20世纪100年间主导人类历史发展的那些主要文化观念。

文化是随着人类历史演进而积累和发展的，文化的观念形态也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和更新的。抽象的文化概念是源于古希腊的哲学观念中“样式”、“气质”、“智能与教养”、“多样的社会地位”等。罗马时期的“文化”（Cultura）来自拉丁语 Colere，有培植和耕耘的意思，同时它又与“祭祀”（Cultus）相近，到中世纪“文化”带有明显的教养和宗教的含义。

文艺复兴时期，强调古典的人本主义文化，贬低宗教神学，“文化”增加了知识启蒙和道德的内容，用世俗的古典文化取代宗教神学文化。17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萨穆埃尔·普芬道夫（S. Pufendorf，1632—1694年）为“文化”定义时引入

^① 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